

## 從中國的世界到世界的中國

蘇聯與南斯拉夫解體以來，舊體制下的前成員國民族衝突頻仍，證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民族問題的解決方法其實也只是一時的權宜之策。<sup>1</sup>在許多觀察者看來，這些衝突對中國似為不祥之兆，因為中國的多民族制度至今仍被視為蘇聯模式的變體。

這就引發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中國的多民族制度能夠持續多久？即使在中國國內，警報也已響起，當前的國際情勢已逐漸影響到中國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因而加強各民族間的「民族團結思想」在現時顯得尤為重要。<sup>2</sup>儘管中國對外界的影響懷有憂慮，一些西方國家的中國學者卻仍對中國的內在活力保持信心。中國會像前蘇聯一樣，隨着集權主義的日漸瓦解，隱匿的國中之國在長久的壓抑後重新崛起嗎？<sup>3</sup>儘管有報告預測中國的多民族制度仍將維持相對的穩定，但也有研究表示其未來變數極大，甚至有人認為這種制度即便不會馬上崩壞，終究也難逃一劫。<sup>4</sup>

成為問題的主要不是中國各民族在民眾層面的日常關係，而是北京認可並提倡的官方的民族關係模式。毫無疑問，官方的民族關係模式一定反映了佔全國人口92%的漢族同散居於中國各地及其廣闊邊疆的少數民族之間的長期互動。<sup>5</sup>不過，中國當前的民族制度主要傳達的顯然是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取向。因此，準確了解中國共產

黨民族政策的起源與演變，不僅有助於理解中國當今的民族制度，同時對預想未來也極具指導意義。

迄今為止，英語世界對中共歷史上民族政治的代表性研究，往往基於馬克思、列寧、斯大林關於民族問題的論述。最近幾年探討當今中國民族問題的研究，也依然受到這些研究的影響。<sup>6</sup>然而，這種意識形態範式對於解讀中共民族政策的歷程和現狀，其實助益不大。原因有三：其一，雖然中共表達對民族問題的立場時的確使用了馬列主義的語彙，但教條化的官方文獻非但沒有闡明，反而還隱瞞了中共在不同時期採取不同政策的實際原因。金德芳 (June Dreyer) 在其代表作中表示，社會主義經典本身較為模稜兩端，可作多種詮釋，因此「中國共產黨在制定少數民族政策時，自然可以不拘方式，而無悖於意識形態的正統性」。<sup>7</sup>若情況果真如此，馬克思主義經典又如何能有助於理解中國共產黨的各種政策行為？

其二，用馬列經典解讀中共民族政策，趨於誇大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其他民族主義政權與組織的不同。譬如，金德芳就過分強調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差別，甚至無法判斷中共在制定少數民族政策時，「究竟是對蘇聯模式的肯定，還是對國民黨的否定」。<sup>8</sup>雖然在冷戰時期，亞洲共產主義者所表現出來的民族主義特徵曾一度讓西方國家感到困惑，但冷戰後的環境卻讓西方更好地理解亞洲共產主義者看似矛盾的民族主義。其實，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在民族構建的綱領上有許多相通之處，因此，二戰結束時，兩黨就已在中國民族問題的基本點上達成共識。

其三，以馬列意識形態研究中共政策的制定，得出的結論往往建立在泛讀馬列主義專著的基礎之上，而忽略了中國共產黨自身歷史的實際經驗。這一問題源於冷戰時期兩大陣營之間的信息隔斷，尤其是社會主義陣營建立的信息審查制度。在信息受到壓抑的時代，有關當代中國的可靠資料極度匱乏，西方國家便以解讀蘇聯的

既定模式套用於對中共行為的研究。沃克·康納 (Walker Connor) 以列寧在民族問題上採取的革命策略為「鐵律」，並用之於解讀中共，就是一例。

根據康納的說法，列寧的「鐵律」規定了以各種政策動員少數民族並將其納入革命隊伍。這一策略的個中關鍵就在於民族自決權的先立後廢，共產黨在掌權前向少數民族承諾民族自決權，而在執政後則否認其權力。<sup>9</sup>然而，康納將這條「鐵律」套用於中國共產黨，就違背了歷史事實，因為中共早在掌權之前就已不再支持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對中共的實踐，需要在列寧的策略以外找原因。

與強調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不同，學界的另一種觀點更側重於研究較為成熟的古代中國，強調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悠久歷史之間的關聯，聲稱「當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高層文化建構實質上是對中華王朝國家文化及文明的繼承」。<sup>10</sup>有趣的是，不論是傳統文化論，抑或是馬列主義論，都強調中國當前制度不合時宜。兩種解讀分別立足於中國的久遠和最近的過去，都缺乏一種貫通過去與未來的歷史動態的體察。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的作為既不表現為妄圖未來，也不表現為固守過去。已故的漢學家史華茲 (Benjamin I. Schwartz) 曾指出，在中國共產黨的世界觀裏，共產主義只是屈尊於儒家思想和自西方輸入的民族國家觀之後的「第三類」。這三類觀念互為補充也相互糾雜，混而合一構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世界觀。<sup>11</sup>這些要素間的張弛表明，中共與歷史上的其他革命力量一樣，既承載傳統，也推動改變。

本書重點關注中國共產黨在1921至1945年間民族政治立場的形成與發展。這一過程的最終產物既非蘇聯模式的複製品，也不是中國歷史的遺跡。在不同情勢與環境下，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制定與史華茲指明的三種觀念發生不同的關係，結果既有歷史性的傳承，也不乏劃時代的革新。要理解中共民族政治立場的形成，必須了解中

國民族政治的歷史背景，因而在進入正題之前，我們有必要首先理清一些相關的歷史概念與先例。畢竟，無論如何定義中共的政治取向，也只是中國歷史性更新的其中一環。

## 歷史性更新

歷史性更新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上並不少見。安東尼·史密斯 (Anthony D. Smith) 在研究民族的起源時，指出了他稱之為「族類」(ethnie) 的群體所共有的堅忍不拔的特質：

族類一旦形成，不僅特別能夠經受「正常」的滄桑變遷，還能延續數代、甚至數個世紀。族類會形成特定的「模式」，包容各種社會文化進程的展開，承受來自不同環境與壓力的衝擊。<sup>12</sup>

通過抵抗、改變，或適應而求生存，是人類群體的本能。上述引文表明任何族類都具有的兩大基本特質：堅韌與靈活，或如史密斯所說，「適而恆定」、「變而不移」。<sup>13</sup> 由此看來，任一歷史進程的意義就在於它不僅連繫過去，同時也投射未來。

過去種種革命與動盪、討伐與戰爭、科技突破與大規模人口變遷等歷史事件，在當時觀者的眼中，的確看似劇烈宏大，但在歷史的長河裏，其社會環境所受到的衝擊卻十分有限。即便這些事件看似產生了積極的效果，最終仍難免被構成歷史惰性的傳統價值、文化、制度所抵銷。胡適是中國20世紀初的改革先驅，他曾敏銳地指出了改革動力與歷史惰性強弱之間的關聯：

5 凡一種文化既成為一個民族的文化，自然有他的絕大保守性，對內能抵抗新奇風氣的起來，對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入。這是一切文化所公有的惰性，是不用人力去培養保護的。……文

化各方面的激烈變動，終有一個大限度，就是終不能根本掃滅那固有文化的根本保守性。

因此，儘管胡適大力倡導中國的「全盤西化」，他的實際目的其實只是獲得中西文明合璧的「文化大變動的結晶品」。<sup>14</sup>

然而事實上，任何歷史進程都不可能是照單製造的文化結晶過程，其中必定會受到來自多方力量的推拉與調和。在一個新興的社會模式中，保守一方會試圖扭變新環境以符合舊文明，而改革派或革命派則會調整舊有規範以適應新的環境。這種妥協是任何所謂歷史的進步都無可避免的，也就是說，歷史的進程中，並沒有絕對的敗者或贏家，只有多方力量在同一過程的不同方向互相作用。歷史上，所有曾被放逐到歷史廢墟的人與事，都會有後繼者在人類進程的新階段捲土重來；而所有名留青史的人與事，也都難免背負着前塵敗績的一點污名。正是以這樣的方式，社會與文化不斷地更新。

中國有世上最古老的族群，也是最年輕的民族國家，在這片土地上，歷史性的改變與承傳一遍又一遍地上演。<sup>15</sup>史密斯發現，三種族類的更新運動——領土的、血統或朝代的、文化的更新，都以族類主義(ethnicism)為驅動力。族類主義是現代民族主義的前身，史密斯將其定義為一種「應對外界威脅和內部分裂的防禦反應」，「試圖恢復原狀，回到古老時代的理想圖景」。<sup>16</sup>不過中國歷史上的真實情況卻更為豐富，傳統的族類主義可以與現代的民族主義同樣堅定而宏大，而過去的理想圖景不僅為更新作指引，還為擴張壯大提供正當的理由。

此外，中國國家體制的更新並不總是由同一族類來完成的。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裏，中國緩慢地進入現代，過去的理想圖景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19、20世紀之交，中國的族類主義被民族主義所淘汰，中國人心目裏「中國的世界」這一形象也被「世界的中國」所取代。